

成果公报

课题名称：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子弟的语言选择与身份构建——北京市农民工子弟个案研究

课题批准号：CAA12017

课题类别：青年专项课题

课题分类：教育政策与综合问题

课题负责人：何丽 副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

主要成员：冯蕾、王如利、李燕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缘起

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外出务工形式由单身外出为主转变为举家外迁务工为主，由此形成了农民工子女这个特殊群体。在随父母融城过程中，农民工子女面临着语言再社会化、身份识别和多维重构等问题，这阻碍了该群体的顺利融城过程。本研究选择北京市作为个案研究地点，基于以下考虑：北京市作为超大规模的直辖市，对农民工吸纳能力强，极具研究代表性；北京的国际环境和多种语言和方言的汇流对农民工子女的语言选择具有冲击力，复杂的外部环境对于身份的认识产生了巨大影响。有鉴于此，无论从理论而言，还是从实践出发，本研究都具有较大意义。

（二）研究内容

本研究选取北京市城郊昌平区和顺义区两所具有代表性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以及海淀区和朝阳区六处具有代表性的城中村作为调查点，通过长达两年的观察，同时采用问卷和访谈等方式，获取了第一手材料。本研究包括六章，从内容上看，拟划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到第四章，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法意义和方法、相关研究述评以及理论基础，同时，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抽样和过程行了详细描述。

第二部分为第五章，即数据的分析和讨论。该部分的实证研究是本研究的重点部分，分为城郊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和市区城中村的农民工子女两大块。分别考察了农民工子女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身份认同等，在此基础上，从客观的城市符号和交际范围到主观的语言心理，探讨了语言和身份的关系，突显了语言在身份认同中的重要性。此外，本部分还根据年龄、性别、来京时长、

留京意愿等变量进行了相关因素的分析 and 总结。

第三部分为结论。本部分高度概括了农民工子女言语社区的特点、语言再社会化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语言选择与身份调适以及身份构建的形态模式，在第四部分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子女语言和身份的密切联系、社区形态特点、交互模式 and 作用进行了提炼、分析和总结，同时进一步在理论上锤炼 and 提升。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搜集语料 and 数据。定量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法和数据统计分析法，定性研究则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法、观察法和访谈法。

1.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本研究数据搜集的主要方法。根据研究目的设计调查问卷，通过预调查对问卷进行检验 and 修订，最终确定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调查对象的年龄（包括生理年龄 and 城镇年龄）、性别、家乡等在内的农民工子女的基本信息的收集；第二部分涉及农民工子女语言能力（包括老家话能力 and 普通话能力）、语言态度、语言使用、身份意识、自我认同等在内的资料的收集。在展开田野调查时，根据具体的调查对象来确定问卷自填 or 问卷代填的方式，其中代填的情况主要包括调查对象要求代填 or 研究者与调查对象通过 QQ、微信等网络聊天工具 or 电话等方式进行联系时。

2. 文献研究法

主要通过查阅书籍刊物、网络资源搜集研究所需资料。网络资源主要通过中国知网、国家统计局网站、教育部网站、地方统计信息网、百度百科等途径搜集包括文献资料、调查统计报告、政策法规、新闻报道等相关资料，对其进行筛选提炼 and 分析总结，为此次研究提供材料支撑。

3. 访谈法

根据调查问卷勾选的情况，选取典型样本（农民工父母 and 农民工子女）进行个人深度访谈，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集体访谈（教师及学生等）。通过访谈收集的材料可以对数据分析进行有效说明。

4. 观察法

观察法主要用于在收集调查对象语言资料时克服观察者悖论，即不让调查对象因为正在受试而影响其语言使用的自然状态。在预调查阶段确定调查点和筛选调查样本时，研究者主要采用隐匿观察法，让调查对象放下戒备，处于日常自然状态来观察他们的真实语言生活，这样一方面能够避免调查对象提供不实信息，另一方面能够避免调查

对象因对自己实际情况认识不清而使调查数据资料出现偏颇。在正式调查阶段，研究者结合了参与式观察法进行进一步调查分析，例如作为志愿者教师和农民工子女频繁接触和交流等。

5. 统计分析法

使用统计软件进行频次、百分比以及相关因素的统计和分析。

二、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1. 农民工子女的言语社区及其特点

农民工子女言语社区具有特殊性，属于非地域性的精神言语社区。农民工子女家庭的工作不稳定性和流动性导致了相互交际无法以单位为核心，言语社区无法以地域划界，更多地是精神社区范畴的认同，该群体具有高度同质性，交往较频繁，在语言使用上自成体系，是具备与其他社区明显区别的、抽象的精神言语社区。

农民工子女的言语社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局限性和开放性。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生活，交际范围以父母、乡邻、伙伴为主，居住环境呈现“城中大杂居，城郊小聚居”特点，该社会网络聚合密度高、强度大。农民工子女融城初期，其身份认识是交叉、模糊，甚至是反复的，家庭作为基本单元，辐射开来的交际群体同质性高，所处的社会阶层和身份较单一，孩子对语言多样性的认识和感受并不深刻，这些特点反映出农民工子女言语社区的局限性。同时，农民工子女言语社区具有开放性，尤其是融城一段时间，进入学校之后，新的环境对语言行为产生影响，从原先高密度强度的聚合圈临时剥离出来（同时保留重叠关系），在互动过程中，语言选择悄然变化，身份认识逐渐清晰，单一身份逐渐向双重甚至多重身份调适。

(2) 有界限和无界性。同农民工父辈一样，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农民工子女和市民间的隔阂，在内卷抱团过程中表现出极高的同质性，这不利于增强融城的认同感。农民工子女社区的认识仅限于对家庭、学校、活动区域的狭隘理解。在他们或主动或被动接触多元、复杂的新环境后，农民工子女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极力扮演不同角色，形成不同维度的身份，重新对自己进行社会归类，在社会心理上调适自己的“市民”行为。总而言之，农民工子女初期的同质性高的状态是囿于居住地同质性高的现实，无法选择自己的行为 and 观念乃至身份，这种有界性是瞬时的。随着融城意愿加强，对城市认同提升和城市文化的适应，农民工子女必然会剥离出有界的聚合圈，逐步进入无界的、多元化和复杂的社会情景中，去激活自己身份的各种维度。

(3) 虚拟性和瞬时性。农民工子女在随父母迁移的过程中，在不

同的区域空间移动，处于不稳定状态，其言语社区具有虚拟性。在这种家庭的封闭性和流动过程的开放性的看似矛盾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子女越来越多的和城市语言和文化发生碰撞，渴望从语言行为上冲破虚拟的精神社区束缚。同时，相对于家庭单位的稳固和持久，虚拟的精神言语社区具有瞬时性，其聚合圈的密度和强度也随着向外辐射而逐渐衰减，因此在农民工子女言语社区开放性显著的同时，瞬时性也突显出来。面对多样化的外围语境，出于对强势语言文化的顺应心理，农民工子女主动剥离出封闭的社区，吸纳越来越多的信息，最终促使量变到质变的蜕变，积极融城，这与父辈的融城过程不尽相同。

2. 农民工子女语言再社会化特点和影响因素

(1) 农民工子女语言再社会化特点

首先，语言的适应性通过语言态度和融城意愿体现。农民工子女接触新社区环境时，立刻突显的是语言差异和交际能力的差距，选择迁入地的强势语言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此外，对城市生活的追求和渴望是农民工子女语言再社会化的重要心理动机。

其次，提高语言适应性是融城的基础之一，是身份调适的显性方式。农民工子女语言再社会化过程实质是原有语言行为习惯和新环境的主流语言文化不断博弈的过程，是了解迁入地语言使用习惯和交际规约并以其为参照不断调整顺应的过程。根据农民工子女的内部分类，在老家成长一段时间的农民工子女在融城过程中面临的语言身份冲突更为激烈，其语言再社会化过程更为复杂，在融城过程中通过学习、模仿来调适语言行为规范和交际方式以实现语言的再社会化；对于在京出生或婴幼儿随迁的农民工子女，其成长初期的语言观念和语言行为更多地受到父母、学校和同伴的影响，较早接触了社区外的主流文化和语言行为规范，因此语言适应性更强。

最后，语言再社会化具有趋向性。农民工子女的居住社区作为“缓冲地带”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去消减语言文化的碰撞和身份认识和转换的带来的“休克”。同时，该群体语言再社会化过程呈现多元化特点，即在不同的交际活动中出于不同交际目的而做出不同的语言选择，这有利于其语言适应能力的发展和有效融城。

(2) 农民工子女语言再社会化的影响因素

在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的框架下，本研究认为，农民工子女再社会化过程中，家庭的影响有限，其再社会化过程是在同伴群体的同化过程中实现的。一方面，农民工父母工作辛苦繁重，无暇管教子女，其子女在课余与同伴的游戏交流中反复巩固和实践主流文化的语言行为规范；另一方面，父母对于主流语言文化的传授具有局限性，诸如说话带有口音或者对主流文化理解不全面等，因此子女们更多的通

过同伴间的模仿、游戏和实践来强化相关知识技能和规范，可以说，同伴对于语言再社会化过程的影响是第一位的。

3. 农民工子女的语言选择和身份调适

(1) 人口迁徙和地理环境的改变是语言选择及身份调适的前提。人口迁徙即农民工子女随家人向大城市迁徙，逐渐疏离了自己的乡音土话，更多地认同强势的通行语，而地理环境与农民工子女及其家人的聚合度相关，言语社区封闭程度高，社区聚合度高，因而同质性高。此外，语言文化的交融影响农民工子女对家乡语言文化的认同和传承，本文研究发现，第二代农民工子女对家乡的文化风俗知之甚少，认同度不高。

(2) 语言能力体现了身份选择的可能性。言语社区的语言竞争首要表现在语言能力高低和语言习得能力强弱上，同时也受到语言环境的影响，其语言态度、语言使用乃至语用功能会相应地突显交际者的身份意识。

(3) 语言态度显像地表现出语言和身份调适的过程。农民工社区语言环境的相对单一性以及新言语社区的语言环境的复杂性迫使农民工子女调整环境系统中各个作用因素，以重构同质、即时的言语社区去平衡自己的身份认识。农民工子女群体冲破封闭社区藩篱的迫切愿望以及对迁入地强势文化和语言的积极态度让该群体不断明确不同语言的地位和关系，明晰各语言的语用功能，最终影响对语言的选择和实现身份的动态构建。

(4) 语言心理代际差异不明显，父母语言观对子女语言选择产生一定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调查对象认为语言和身份关系密切，因而语言的心理意识反之影响了身份意识，最后影响其融城的进程。在深度访谈中了解到，大多数农民工子女的语言选择多少会受到父母语言观的影响，意识到普通话强大的工具性、便利性和实用性。访谈中一位来自四川的妈妈说：“我家娃娃就不怎么会说四川话，我也不教他，平时也不跟他说，他会说普通话就行了，我想让娃娃以后留在北京，这里挣钱比家里多，在这边只说普通话就行，他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可见，父母的语言观念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和语言选择产生影响。

(5) “语域”或“语境”对身份意识起决定性作用。农民工子女的话语范围包括日常交际、媒体使用、民俗仪式、学校等。日常交际中，以血缘和地缘为主聚居环境里，社区聚合度高，通行家乡方言，对家乡的民俗传统保持较好，因而其子女的语言学习和文化融合有别于杂居环境下的农民工子女。本文的研究还发现，融城意愿消极的农民工子女对语境的适应性较差，更倾向于寻找或回归与自己身份相符的语

境。

总之，农民工子女群体随着社会分化而产生，其言语社区内的语言系统有其独特性。作为迁入地的异质群体，他们必然面对着交际主体改变、语言竞争、身份认同等一系列的问题。农民工子女社区成员通过选择语码、语用调适、切换身份来适应新环境。此外，社会分化造成的社会形态的改变必然导致语言身份的改变。由于人口异动、语言关系变化、语用功能改变以及诸多复杂因素的作用，农民工子女的言语社区受到干扰，并逐步与强势语言文化发生作用，最终影响该群体对语言的态度以及对自身身份的反思，通过语言竞争和身份竞争，逐步实现语言身份的动态构建。

4. 农民工子女言语社区的身份的动态构建

(1) 身份的整合和发展

农民工子女融城过程中所面临的身份构建过程反映出身份的认同过程，身份确认显得尤为重要，身份确认成功可增强社会的稳定性，激发群体的积极情绪。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所产生的农民工边缘人群不得不面对城市的空间隔离，即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彼此隔离又毗邻而居的现象，这种不仅存在于物理空间层面，同时也存在于精神空间层面，由此引发这个高同质性的群体出现内卷化，虽结构稳固，却群际交往弱化，而群际交往正是社会整合的媒介，因而导致社会整合困难。在这一系列的矛盾中，随父母迁徙的农民工子女面对的问题更为迫切。从内卷化来看，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意识处于构建初期，虽然随父母聚居在城中村，但内卷化表现不如父辈明显。从群际交往来看，农民工子女有较强烈的群际交往的渴望，此外，通过学校平台组织的各种活动和培训，农民工子女比父辈有更多机会参与群际交往。正因为不同的社会情境和社会网络空间，造成了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在构建身份过程中的差别，对身份的追寻途径和认同也不尽相同。

(2) 语言认同度和文化心理

农民工子女对身份的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实质是对文化的认识到接受过程，发展的过程没有明确的边缘或区分，而是一个有所反复的量变过程。表现在语言上，语言的认同度反映了文化心理的趋同度，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而成为了文化载体的一部分。接受迁入地的文化，学会当地的方言，处理好标准语、方言和老家话的关系，也是该群体身份调适并最终融城的必然表现。另一方面，农民工子女进行群际交流时，会积极主动地去接受当地语言文化。相反地，当地人作为权威、优势群体，不会主动与流动人口接触，也无意了解外来的“弱势”文化。在这个互为作用的过程中，农民工及其子女无疑在语言认同上具有被动性，表现在语言身份上，即是对自己家乡母语和文化的

理智上的消极态度。群际交际过程中，在“临时剥离”原先的聚合圈之后，农民工子女构建了临时、有效的言语社区，在这个最接近当地文化且不用协调原先言语社区关系的语境里，把模糊的身份意识逐步清晰化，并通过新的人际关系构建最适宜于融城的成长模式，最后实现身份的重构。可见，语言是最初和最显性的体现方式。

（3）符号象征对语言身份构建的意义

选择一种语言即选择了一种文化，并以这种文化身份存在。社会网络结构往往交织着不同文化，无论是社区主流文化还是亚文化，其根植的土壤必然赋予这个区域的人们一定的身份特征，语言的选择和使用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农民工及其子女对于代表当地文化特征的显性符号感受深刻，诸如北京的天安门、故宫等显性城市符号，是该流动群体最容易记住的显性标志，对于北京本地人而言，也体现了一种身份认同、自豪感和向心力。居住在城中村的农民工大多以技能型或个体经营为生，家庭条件稍好，其子女融城欲望和身份意识更强烈，老家话的通行度在社区开放度高的情况下通常以家庭为单位，这使子女在语言学习、转用上更具优势，这有别于城郊以血缘和地缘为聚居形态的农民工子女。在调查中发现，对于城市文化表征符号，城郊农民工子女对天安门、故宫等认知更为模糊。通过访谈，城郊孩子的父母大多生活贫困，不少家庭依靠废品回收或种菜为生，生活技能低，绝大多数孩子未曾也未敢想过游玩天安门、故宫等文化景观，因此子女们对这些城市表征符号概念模糊，缺乏向心力，不愿谈及相关话题，在认同感和自豪感上较城中杂居子女弱，显示出文化融合的进度和效果明显低于语言融合。

（4）实践中的语言身份构建

融城过程中构建的言语社区具有不稳定性和复杂性，这使该群体从单一身份裂变为双重乃至多重身份的过程更趋复杂，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各种语境和“经验空缺”使得他们协商身份时缺乏自信，容易陷入迷茫。农民工子女构建“城市人”的融城过程是连续渐变的过程，言语社区理论静态、整齐划一的、以地缘和社会因素为切分方式的研究无法完全展示该群体语言身份构建的动态过程，相应地，实践社区理论作为言语社区理论的有力补充，逐渐进入研究视野，认为人的社会身份的范畴不是本质或先验存在的，而是在言语实践中随时构建的，人们在言语实践中逐渐同步行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并通过实践构成相对稳固的群体。实践社区理论为农民工子女在暂时剥离居住环境，进入学校等其他环境去适应新的人群，构建新的身份提供了较好地解释。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特殊群体的身份构建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确切语境下通过交际双方的意义沟通、经验分享以及身份协商过程

中逐渐确立的。每一次的具体语境实践就是一次构建身份的尝试。可以说，实践社团理论很好地捕捉到社会与语言共变之间的微妙关系，更多地关注社会空间的流动性和经验的多样性特点，这符合农民工子女的社区特点，即关注的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而不是根据社会范畴和因素生硬切分的“人”，它强调了人的主体作用，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还应当看到，农民工子女的双重身份乃至多重身份是开放、动态的网络，网络中的成员可以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各种身份角色，体现了身份构建中的主观能动性。

（二）推进农民工子女融城过程中的语言选择和身份构建的建议

从理论研究来看，关注语言和身份构建的关系，重视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通过语言心理和语言应用的探索来考察所体现出来的身份问题。同时，提升和完善现有理论的不足，尝试搭建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框架来提升研究水平并指导具体的实践。

从实践来看，首先，针对农民工子女的现状，应该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在农民工子女聚集的地方（例如学校），可以大力开展志愿者活动，通过社会各界的关心和爱心，让农民工子女能体会到农民工社区外的关怀和包容。目前的志愿者活动仅在有限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展，影响面有限，知名度小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无法得到一些志愿者组织带来的信息。其次，加强校际沟通和培训。针对农民工子弟学校客观存在的事实，相关政府部门可以加强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培训、管理，加强校际交流，交换理念，更直接地接触主流的语言文化，打破身份壁垒。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相对落后又自成封闭、独立的体系，很少有机会进行学习交流和资源分享，因此，和公办校的校际交流有助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提升办学水平以及与普通公办校的衔接。最后，打通农民工社区和外部社区的公共空间，丰富农民工社区语言生活环境。政府和公益组织可以开展形式生动多样的活动，鼓励各社区间的交流，破除闭合社区空间的壁垒，组织社区的农民工子女感受城市生活，鼓励农民工父母在营生之余积极参与此类活动，创造农民工子女和父母相处的机会，也拉近农民工子女和城市的距离。

三、成果与影响

1. 本研究立足于田野调查实践，科学地确定调查地点和样本，通过两年的观察访谈，获取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所设计、修订的调查问卷通过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城中村的案例分析，问卷设计合理，所得结论信度高，该问卷可作为今后这类研究大规模调查的范本。

2. 基于该研究所涉及的语言和身份问题，课题组翻译了 36 万字

的学术著作（负责人独立完成 26 万字），并于 2015 年 6 月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该书的美国原作者致信给译者，表示出对课题研究聚焦的兴趣，因此，该译著的发行产生了一定的国内乃至国际影响。

3. 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兼南大 CSSCI 检索期刊）上发表论文 3 篇，两年内共被引用 4 次，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4. 基于本课题研究，参加了 2014 年北京市教工委组织的“北京高校青年教师社会调研项目”，所撰写“北京市农民工子女语言生活及融城状况调查”一文获得二等奖。

四、改进和完善

本研究报告的完成只是一个起点，仍有许多饶有意思的问题去思考 and 解决，也有一些遗憾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首先，研究样本量可以在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囿于研究时间和研究人员精力的局限以及研究范式的制约，我们在选择样本时根据文献和相关统计进行了预判，选择了极具典型性的样本展开田野调查工作，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根据该个案成果，进一步扩大调查样本量，得出一个趋向性结果。

其次，身份的动态构建阶段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在考虑语言因素的前提下，如何构建一个具体的身份构建评估模式？这个饶有意思的思路也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目标。

最后，在研究能力、时间和经济保障允许的条件下，可以开展不同区域农民工子女语言选择和身份构建的横向对比研究，去发现拥有相同精神言语社区的群体，在不同的区域融城过程中，所体现的语言和身份特征有什么特点。这对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将起着积极作用。